哲 学 研 究

文化回馈:人类文明交流的新境界
——以“佛教中国化”为例

张 志 刚
(北京大学 哲学系、宗教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如果着眼于“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从“玄奘西行取经”入手来探讨“佛教的中国化”,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把“佛教的中国化”视为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一个范例,而且能够借此范例来展开理论反思,提出并论证一个新的理论概念——“文化回馈”。这一新概念至少蕴含着三方面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即有助于提升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理念,有助于继承与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助于推进并深化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多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关键词: 佛教的中国化;玄奘取经;文化回馈;比较研究;人类文明交流
中图分类号:B 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2-0032-07

一、新概念:“文化回馈”与典型例证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它可称为“文化回馈”。顾名思义,所谓的“文化回馈”意指一种具有“文化回传性质”并带有“回报或感恩情怀”的文明交流形式及其境界。笔者试用这一新的概念来表达如下比较复杂的学术畅想:

如果把人类文明史看成“一个交流与互鉴的弥久过程”,自有交通与通信的起码条件,不同的文明便开始了接触、交往、借鉴与融合(当然也包括排斥、矛盾、冲突与战争等),那么,随着地球村的形成,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文化交流领域很可能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样一类文化回传、文化回馈现象:某个文明社会曾从另一种文明那里学到了某些优秀的文化因素或先进的文化成果,诸如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然后历经磨合或适应而融入本土文化,又经过千锤百炼而锻造成富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发明、工艺、作品、理论、思想、精神、智慧等,此时再将这些更出色、更成熟的文化硕果,回馈或回报给整个人类文明世界。

众所周知,在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记载着大量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往事,如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而盛于唐代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两赴西域”,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中国四大发明”的外传,中国瓷文化的外传,中国茶文化的外传,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的传入,“玄奘西行求法与鉴真东渡送经”,“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等。如果我们抱以前瞻性与建设性的研究视野,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来拾取一段佳话,它不仅堪称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范例,而且可供我们探讨前述“文化回馈”概念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佛教的中国化”十有八九可以说是不二选择了。让我们从“玄奘西行取经”说起。

为什么要把“佛教的中国化”作为范例,且从“玄奘西行取经”说起呢?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和“玄奘西行取经”,我国学界已取得了大量的研

收稿日期:2015－11－28
作者简介:张志刚,男,山东青岛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西宗教哲学比较的几组关键问题”(项目编号:10JJD720013)。

究成果,并已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历史意义。例如,王介南在新近出版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里指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也是中国最大的宗教。佛教和佛教所代表的印度文化是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外来文化。外来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①又如,赖永海主编的十五卷本《中国佛教通史》里指出:“在中国佛教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玄奘都毫无异议地屹立于最伟大的人物行列。作为一位佛教高僧,他不畏艰难,只身一人,前往天竺求取佛经,其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佛教范围而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千百年来一直鼓舞着中华民族努力奋斗。从佛教言之,玄奘不仅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史上成就最大的学者,同时又是继承印度正统佛教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翻译的经论既多且精,弘扬佛法真义也最为得力,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②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构想的提出与实施,“佛教的中国化”和“玄奘西行取经”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带动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宗教走向世界的典型意义越来越深受我国“政、教、学”三界(政府、宗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佛教源于古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业已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了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创造了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使佛教传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主席在西安大慈恩寺迎接印度总理莫迪时又讲到:你去年陪我访问你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介绍了中国高僧玄奘在那里研习佛经的情况。玄奘回国后,就是在大慈恩寺里翻译佛经的。这座大慈恩寺是中印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我们回顾中印两大文明的交流互鉴,就是要推动两国友好交流,为中印关系发展增添新的活力。莫迪也表示:玄奘法师是印中文化交流的象征,他的印度之行早就把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了。③

笔者认为,若能把上述两方面综合起来加以思索,我们在现有的研讨成果基础上还可以增添一个新的学术视角,这就是接下来所要论证的“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

二、新视角:外来宗教中国化比较研究

我国现有的五大宗教,除了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外来的”。大致说来,这几大外来的宗教又都是通过“南北海陆的丝绸之路”传入华夏大地的,佛教的传入可远溯至两汉之际(约公元前 2 年);伊斯兰教是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传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得以落足华夏大地则经历了“曲折的四传”,即唐朝“景教”的传入,元朝“也里可温”的传入,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鸦片战争前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相继传入。这些久远的史实无疑表明,古老的中华文明历来就是兼容并蓄的,而上述几大世界性宗教早已在不同的程度上融入了中国文化传统。虽然我国学术界一直重视各种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研究,但在交叉性、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方面却显得相当薄弱。因此,基于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来进一步加强诸种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肯定有助于我们从学理上更全面、更深入地总结与反思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并为推动今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提供更积极、更有建设性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为了揭示上述新视角的学术立意及其研讨潜力,先让我们耐心过目下面一段较长的引文:

---

① 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5 页。

② 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五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81 页。

③ 参见新华网 2015 年 5 月 14 日发表的《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和 2015 年 5 月 14 日发表的报道《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西安参观》。

基督教与佛教不同;中国人不曾去求基督教……西国人来传教,是西国人自己内心中迫不得已的遣使;他们心中受命于天,只要打开中国的门路,即不问其所凭借的威力都从哪里来。于是乎,传教有条约,有西洋的政治力作后盾。我友张伯怀说:“十九世纪之初,基督教的宣传是一种侵略行为。西国的传教士们把自己所服膺的宗教,用他们国家的武力为后盾,强制的在中国宣传。至于中国人方面是否欢迎,基督教对于中国人生到底有何贡献,并未加以仔细的考虑。二十世纪的开始,就是庚子之乱。从那时候起……中国人拒绝基督教的思想,在在潜滋暗长……大有‘此害不除,中原不安’的愤慨。结果是民国十一年非教大同盟的组织,和联俄容共以后的反基督教宣传与设施。”(见鲁铎七卷一页)基督教既不仗本身的灵光,而仗外国势力以为播散之法,则中国的信徒当然不免于仗洋势,以自卫,以欺人,而中国的人士当然不能不有人民教民的区分,视教民为汉奸,为洋奴,弄得“火烧昆冈,玉石俱焚”。中国人信了基督教,既有作洋奴汉奸的嫌疑,则其所信的宗教,当然不能深入而浸润中国的文化。基督教与中国民族的扞格不入,这未始不是一个甚为不幸的理由。①

这段文字写于 80 年以前,今天的读者需要走进作者的背景,才能予以实事求是的历史理解。赵紫宸(1888—1979)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他不仅被誉为“中国基督教哲学、系统神学的奠基人”“中国教会改革创新的先行者”,也是“提倡基督教中国化的思想先驱”。所以,他是怀着真诚的“中国心”与深厚的“民族情”,才以如此强烈的“理性批评精神”来反省“西方的基督教”在鸦片战争前后传入中国的特定背景及其不良后果的,这种理论反省的目的即在于,重新认识“本真的基督教”——基督教的本来面目与真正精神,从而促使“作为一种外来优秀文化的基督教”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②,这一点是首先要理解的。其次,正好 80 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中国基督教会也随之在很大程度上本土化或中国化了,但谈及“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海内外专家学者大多认为,佛教早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伊斯兰教也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相比之下,“基督教的中国化”却依然显得任重道远,这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表明,赵紫宸先生当年所做的理论反省至今不失“以史为鉴”的意义。再次,赵紫宸先生当年是从“基督教与佛教中国化相比较”的角度来发出上述那段议论的,周济在《中国民族与基督教》一文里具体分析了“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宗教的六大理由”,虽然今天看来那些理由未必全都显得客观,但他在“比较与分析”之后所得出的那个结论却十分发人深省——“佛教是中国人求来的,基督教则反之,是西国人依仗经济与政治侵略而传入的。”显然,这一结论是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的,即主要限于评价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及其不良后果,但在充分意识到这种局限性之后,我们便可以接着深思赵先生的历史感悟了,这就是他所讲的一对关键词“求”与“不求”。

赵紫宸指出,如果中国人需要宗教的话,总是必须中国人自己去求。“求”有三端:“求诸行”“求诸经”“求诸文”,这三者就是指“要做到身体力行”“要到发源地求经求教”“要自己翻译经典”。他一一举例说明,中国佛教在这三方面都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把这三者的顺序调整一下,或许更合乎逻辑思维,也更合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即从“求诸经”“求诸文”再到“求诸行”。这样一来,“玄奘取经与译

---

① 赵紫宸:《中国民族与基督教》,原刊于《真理与生命》(1935)第九卷,第五至六期,现收入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旅——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8—33 页。

② 这里的说法并非笔者动情,而是赵紫宸本人的真实思想。他在另一篇名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里说:“我们是中国人,活在中国的环境里,然而我们亦吸收世界的文化与基督教,亦曾在中国的思想境界里优游”;“我们所应深思熟筹的是如何可以保持我国文化的精神,如何可以开拓此文化使得与世界文化融洽而继增。”详见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本色之旅——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 2、6 页。

经”的典型意义便会凸现出来了。①

关于“玄奘取经与译经”的动机、经历和硕果等,现有史料与论著可谓浩如烟海,为了直接达到论证目的,这里主要参考方立天先生(1933—2014)的研究成果:玄奘(约 602—664),幼年聪慧,家境贫寒,13 岁度僧。西行取经求法之前,他已四处遍访名师,穷尽诸家学说,被推举为“庄严寺十大德”之一,但他仍深感各地佛理不一,亟想求得解决,立志西游取经。史载,玄奘西游取经往返 17 年,行程 5 万里,途经 110 个国家地区,带回大小乘佛典 520 夹、657 部。玄奘回国后,拒绝唐太宗请他还俗的建议,不愿为官,却应诺撰写《大唐西游记》,他把全部时间与精力都投入了佛典翻译。在朝廷的支持下,他经过 19 个春秋的艰苦努力,有计划、系统地主持翻译了大量瑜伽学、阿毘达磨学和般若学的经论,如小乘要典《大毘婆沙》二百卷、瑜伽学集大成《瑜伽师地论》一百卷、中观学派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六百卷等。由于玄奘主持翻译的是印度佛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鼎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理论,故被通称“新译”,被誉为“开辟了中国译经史的新纪元”。玄奘取经与译经之后,其门下人才济济,玄奘本人对“经、律、论”三藏无所不通,被称为“三藏法师”,这在当时可谓前无一人,俗称的“唐三藏”“唐僧”是对这位高僧的最高赞誉、最大尊称。②

总结以上讨论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的一个范例,“玄奘取经与译经”的象征意义至少体现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从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比较研究来看,假如前述“三求”的说法是有学术启发的,而对于任何一种外来宗教来说,“求诸经”与“求诸文”又可以看作“两个不可或缺的本土化前提或步骤”,即只有“取到真经”并“译出真义”,才有可能在另一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与社会处境之下“求诸行”——“践行真谛”“得以认可”并“传播开来”,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三求”比作外来宗教得以扎根、开花与结果的“三乐章”,假如没有玄奘取经、译经的“前奏与续曲”,恐怕便无从“唱响佛教中国化的高潮”。

第二,全面回顾数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往的海内外研究者大多浓墨重彩“盛唐气象”。总的来看,唐朝(618—907)之所以政治昌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其客观原因主要在于,能够做到对外开放、善交友邦、相互学习、兼容并蓄等。唐都长安在当时堪称中外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心,以长安为中心的海陆交通网可抵这四面八方,友好往来的国家或地区多达 70 以上。③ 正因为如此,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的“第一次高峰”出现于唐代。④ 前面提到,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接触”。从“佛教中国化”的大体进程来看,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长期的冲突与磨合,佛教从东晋以后开始融入中国文化,到隋唐

① 关于“玄奘取经与译经”的重要意义,赵紫宸指出,法显玄奘以及成百的僧人,冒万险,辟万难,登葱岭,度雪山,在无路中开路,在无声中得生,或死于去路,或死于归程,或死于异域,或死于种种险阻疾病贫困饥寒,要在佛教发源地求经求教,求大师的指引。他们到天竺去是心灵逼着去的,像在空中获取了不可达到的真际。有人这样做,佛教即要不兴,也不能躲避了弘传广布的势力。这是宗教求诸源的显示。至于宗教须求诸文(经典),佛教实在有其弘甚盛的伟绩,译经一事,起先都是月支、安息、于阗、天竺等外国人做的,因为他们是宣传者,又通梵文;后来中国人自己精谙梵文,且深识佛学的环境与背景,深知中国的文学与历史,便自相传译。所以,在安士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鸠摩罗什、昙无忏、真谛、严琮等人之后,即有玄奘三藏、义净三藏等人“印印皆同,声声有别”的翻译。我们读慈恩寺玄奘法师传,就知道他一生的行状与译述如何的博大。详见赵紫宸:《中国民族与基督教》,《本色之旅——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 25—26 页。

② 以上摘要,详见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1—74 页。

③ 参见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章“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④ 楼宇烈先生讲:“唐代是中国吸收外来文化最多的时期,不仅宗教,包括文学、艺术等等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发展到后来我们甚至都已分不清了。我们现今只能从它的名称当中了解它是外来的。如胡琴,我们看作是中国乐器,其实这个乐器是从西方传来的。为何称为胡琴?因古人将西域人称为胡人。所以,唐代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并被吸纳、融化,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楼宇烈:《宗教研究方法讲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4 页。)

时期创建了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和禅宗等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及其显著特点——“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就是在盛唐气象下形成的。①因此,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整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而将盛唐时期的“玄奘取经与译经”乃至“佛教的中国化”纳入上述宏观背景来展开理论探讨,一种值得向往的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境界便会浮现于我们眼前了。

三、新境界: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笔者之所以从“玄奘取经与译经”说起、以“佛教的中国化”作为范例,提出并论证“文化回馈”概念,并将这个概念视为“一种值得向往的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境界”,主要有如下数种理由。

1. 这种“境界追求”有助于提升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理念

关于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欧美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讲过:“在现今中国,我们的文明与中国的文明有着密切的接触。只是接触的结果,到底是产生胜于这两种文明的新文明,还是破坏固有的文明而代之以英国的文明,这一点还是问题。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至于中国,如果我们视之为学生,可能又是一例,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少得多。如果我把中国人当成我们的学生,而不是相反的话,只是因为我害怕我们是不可教育的。”②

以上引文出自罗素的名著《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 1922),该书是由罗素访华(1920 年 10 月至 1921 年 7 月)后发表于英国各大报刊上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章结集而成的。罗素访华正值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期间,这段时间既是中国知识界“向西方文化学习”的一次高潮,也可以说是“西化思潮”最盛行之时。所以,今天重读罗素的这段论述,我们仍能感受到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譬如,不同文明的相遇与碰撞可能导致哪些结局?人类文明进步是否体现为一个“向先进者学习”的过程?人类文明进程中是否存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现象?显然,罗素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理性而客观的,他不仅充分肯定“学习其他先进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且积极倡导“互为师生、彼此学习、相互借鉴”。

既然罗素提出的这些看法,现已成为国际理论界研讨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问题的主流观点或基本共识,那么,我们进而将“饱含中国经验的文化回馈概念”注入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理论与实践,定会发生非凡的积极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以“佛教中国化”为例来加以领会。正如楼宇烈先生所说:“佛教在中国传入、生根、开花、结果,这样的过程是文化交流中非常好的典范,这是一种和平进行的文化交流,是平等状态下的相互吸收,交流的同时又互相丰富了自己——所以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交流的典范。这是(中国)佛教史的概况。尽管在印度本土佛教于 13 世纪就绝迹了,但在中国却一直延续到现在,并还处于不断发展中。”③如果我们接着楼先生的上述论断来说:佛教虽在其发源地印度几乎失传了,但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却生根、开花、结果了,那么,我们今天将“中国化的佛教精神”沿着“丝绸之路”回传,将其回馈于人类文明世界,岂不意义非凡!

说到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笔者在此以“佛教的中国化”作为范例来诠释“文化回馈”概念及其重要意义,并非意味着“仅此一例,别无其他”,而是更想强调,一体多元的中华文明素有学习、吸收、融合外来优秀文化的传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

① 详见楼宇烈:《宗教研究方法讲记》,第 34—46 页。

②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7 页。

③ 楼宇烈:《宗教研究方法讲记》,第 37 页。

上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教训,尚待我们加以历史总结与理论提炼,以利于人类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友好交往、共同繁荣。

2. 这种“境界追求”有助于继承与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日渐增强,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华文明史研究,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社会近 30 多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还由于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认识到,重新崛起的中华民族拥有数千年的文明传统,而这一悠久且深厚的文明传统,又可以说是整个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或断裂过的”。因而,如果把“文化认同”看作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最高认同”,那么,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来说,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探讨便显得格外重要了。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如何全面地概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海内外学者尚无统一的表述,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基本精神”或“核心价值”,已提出了不少有根据、有启发的观点,如“以人为本”(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以德为本”(崇德利用、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执中、致中和)、“和而不同”(以和为本、以和为贵、和谐)等等。综合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或许我们用如下 20 个字,既能全面地表达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能深刻地体现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生生不息、饱经磨难、旧邦新命、薪火相传的文化精神:“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华文明拥有如此博大的文化理念,她在历史上才会不断融和诸种本土的与外来的文化因素,她在和平崛起、走向世界的今天,也理应一如既往地会通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①

在近些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研究中,常见有些专家学者争论这样一个命题:“是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假如只是站在民族主义或普世主义的立场,此种争论也许是没有多大理论价值或学术启发的。中华民族长达千余年的对外文化交流史表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与对话是丰富多彩的,其切实有效的互动方式,并非“单向的、贴上本民族或普世性标签的输出或传入”,也不但表现为“双向或多向的学习、借鉴、融合、互补等”,还可以开拓一种更为复杂、更有意境的交流与互鉴途径,这就是本文试想论证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回传与文化回馈”。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富有意境的文化交流与互鉴途径,不仅合乎前面所概括的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能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华文明古国的风采——“礼仪之邦、礼尚往来”。

3. 这种“境界追求”有助于推进并深化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既扎根中华文明大地,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又重新走向世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广泛开展交流、合作、互鉴、互惠活动。近两年来,政界与学界齐相热议的“一带一路”便是一种最新的尝试。“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虽然这主要是一种经贸战略举措,但经过近两年来的热烈研讨,各界有识之士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一带一路”不仅在经济与政治上是“一条互尊互信、合作共赢之路”,而且在文化上也将建成“一条友好交流、文明互鉴之路”。在 2014 年 11 月 8 日召开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地提议:“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中国支持不同文明和宗教对话,鼓励加强各国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支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鼓励更多

① 张岂之先生最近指出: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贯穿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产生了魏晋玄学。中国思想文化的再一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由南宋理学完成。在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了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详见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1 日第 16 版)

亚洲国家地区省市建立合作关系。”这里所讲的“以人文交流为纽带”，特别是“不同文明和宗教对话”，的确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讨。

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 60 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表态，它们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以，不少专家学者指出，“一带一路”不但贯通众多国家或地区，而且涉及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会创造更便利的条件、更良好的氛围，通过加强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文化和宗教之间的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互尊互信，避免相互误解甚至彼此冲突，以求人类多元文明的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就此而言，我们确有必要重新认识几大世界性宗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正如我国资深专家耿昇指出的那样，回顾一下中外文化交流史，我们便会不无惊奇地发现，世界三大宗教具有文化交流桥梁作用。例如，源于印度文明的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千百年来同化和改造，不但成为我国西藏、蒙古等地区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且已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的文化交流桥梁。又如，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波斯世界的文化根基，自唐代传入中国，经过千百年来的同化和改造，不但成为我国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里克族、塔塔尔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 10 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要素，且已成为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渠道。再如，作为希腊—罗马文明的标志性成果的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历经多个历史阶段的碰撞与磨合，现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已成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桥梁。①

无论古今中外，人们在日常交往中都渴望“心灵的沟通”。的确，“心灵、精神、信仰”上沟通可谓人世间最深层、最重要、也最难抵达的交往境界了。然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学贯中西的我国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在其晚年总结毕生的学术心得，以精美的“十六字箴言”寄希望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笔者深受费先生学术情怀的感染，故以本文来提出并论证“文化回馈”概念及其意境，以期此种境界追求能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多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增添又一层新意、又一个亮点、又一种动力。

On the New Realm of Inter-civilizational Communication: A Look Back at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with Xuan Zang's Pilgrimage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Zhang Zhig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aking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Sinicization of foreign religions, and especially taking Xuan Zang's (玄奘) pilgrimage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in the cas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will enable us not only to appreciate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as an example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human civilizations, but also to engage i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at basis, putting forward and arguing for the new concept of "cultural feedback". This new concept entails theoretical value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t multiple levels. It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ideas for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human civilizations,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ior aspects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the deepening and enhance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of plural and pluralist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Xuan Zang's (玄奘) pilgrimage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cultural feedback, comparative study, inter-civilizational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昇译，“译者的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 页。